

雲岡石窟營造的時空順序*

韋正
北京大學

摘要：雲岡石窟的營造，隨著時間和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轉換新的開鑿地點。最早開鑿的是曇曜五窟及略晚的第7、8窟，此後是第3窟和第1、2窟，再後是第11–13窟，最後是第5、6窟和第9、10窟。另覓山頭開大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新皇帝即位，曇曜五窟、第3窟、第5、6窟是帝王窟，第1、2窟，第7、8窟，第9、10窟分別是對應帝王窟的“衛星窟”。

關鍵詞：雲岡石窟、曇曜五窟、北魏、石窟營造

* 雲岡石窟供養人和題記的核實得到雲岡研究院郭靜娜女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引言

關於雲岡石窟的研究，年代學問題是關鍵，是其他研究的基礎。關於雲岡年代學研究，早期以主要從美術學角度切入的長廣敏雄先生，後來以主要從考古學角度切入的宿白先生的意見最有影響力¹。兩位先生的分期意見雖然有所不同，但分期理念接近，都根據新出現的重要特點，並結合文獻記載推定洞窟的具體年代，進而劃分出大的期別。兩位先生對雲岡石窟研究貢獻巨大，但毋庸諱言，兩位先生對分期的表述都是單線式的，即將雲岡各窟按照開鑿順序串聯成線，為每個石窟在時間軸上找到對應點²，其優點是有助於簡潔明瞭地認識研究對象的主要階段性特徵，缺點是將複雜的現象簡單化。

包括石窟在內的很多事物、很多特點會延續很長時間，會跨越直線式分期。而且，很多對象的產生雖然有具體的時間點，但由於資訊的缺失，今天回溯時只能推定到某個時段，甚至無法斷定其期別，但為了表述的方便最後多被按照傾向性歸到某個期別之中。直線式分期結論之下隱藏的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交錯狀態必須加以注意，更要

¹ 長廣敏雄先生的意見可以看作早年日本學者意見的代表，他們的意見也不斷修正。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時，長廣先生的意見可表達如下：第7、8雙窟，為獻文帝時期(465-471)；第9、10雙窟，孝文帝延興五年(475)頃落成；第5、6雙窟中的第5窟，孝文帝太和七年(483)頃落成或竣工，第6窟太和十年(486)以後完工。見長廣敏雄《雲岡と龍門——中國の石窟美術》，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3年。宿白先生的意見如下：第7、8雙窟，為孝文帝初期(471-?)；第9、10雙窟，孝文帝太和八至十三年(484-489)頃落成；第5、6雙窟中的第6窟，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八年(486?-494)以前；第5窟，太和十年(?)至十八年(486?-494年)遷洛時尚未完工。見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1頁。

² 不唯石窟考古，目前中國國內其他方向的考古研究採用的也多是這種分析和表述方法。

注意的是兩個期別交替之際的情況更為複雜，某些現象某些材料究竟該歸於上一期之末還是下一期之初需仔細斟酌而定，並且需要隨著資料和認識的變化而調整其歸屬。更重要的是，事物的變化都是在空間中展開的，同一時期同一地點可以並存多種不同文化現象，不同地點同時存在的文化現象常常是新舊雜糅的。因此，將不同地點的某種共同特點視為同一還是不同時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在討論較大地域範圍內的文化分期時尤有必要。這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也是不太容易解決的問題。

相比而言，雲岡石窟涉及的地理範圍不大，雲岡石窟開鑿的總體時間也很明確，大部分洞窟的保存狀況也不算很差，不少洞窟的開鑿時長也大概可知，這就為從空間角度觀察雲岡不同洞窟開鑿的前後順序提供了可能。不利的一面是，雲岡石窟是連續性工程，舊窟未完，又開新窟，同一時期可供選擇的樣式又不止一種，工程進行到半途又可能改從新樣，這就使新舊文化因素的交替呈現出極其複雜甚至“倒置”式狀況。但是，儘管有這些困難，對雲岡石窟的總體認識還是必須以對具體洞窟的認識為基礎，對具體洞窟的年代刻度盡可能進行比較合理而不一定是非常精細的判斷。特別是對那些存在於前後期之間的過渡性特徵，必須賦予更恰當的歸屬，才有望使各窟在雲岡營造史上各安其所。

鑒於以上情況，本文將盡可能吸收前人，特別是長廣、宿白先生的分期成果，同時也對某些洞窟或某些特徵的年代問題重新進行討論。雲岡石窟的開鑿不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而是你未唱罷我已登場，單線式的發展模式不存在於雲岡營造的實際過程中。因此本文將注重雲岡不同洞窟開鑿過程中的共時性，以及每個洞窟的始鑿年代和本來規劃特徵。也就是說，本文將努力回歸雲岡石窟營造的歷史“現

場”，從時空兩個方面探索雲岡石窟的營造狀況，嘗試推導出雲岡石窟營造的時空順序。

一、第 7、8 窟的時空意義

第 7、8 窟所涉及的問題不僅與雲岡分期有關，也與雲岡石窟的空間分佈狀況有關（圖 1）。第 7、8 窟是雲岡營造複雜化的開端，因此，第 7、8 窟在雲岡營造時空順序的討論中首當其衝。不論是長廣先生將第 7、8 窟置於獻文帝（454—476, 465—471 在位）時期，還是宿白先生置於孝文帝（467—499, 471—499 在位）初期，都是將第 7、8 窟與曇曜五窟截然分開而置於其後，並且沒有討論第 7、8 窟的空間位置。本文主張第 7、8 窟與曇曜五窟同屬雲岡最初營造的工程，始鑿時間略晚於曇曜五窟，是與帝王窟關係密切的重要石窟。這基於以下考慮：

其一，前賢將第 7、8 窟與曇曜五窟截然分開的主要理由是彼此差異顯著。但是，將第 7、8 窟與曇曜五窟進行對比這個行為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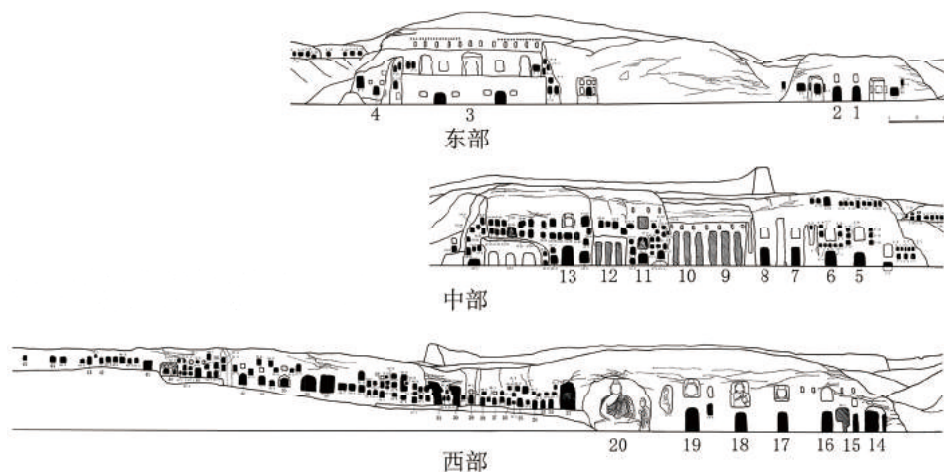


圖 1：雲岡石窟分布示意圖（採自《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附頁）

可能就是不甚合適的。文獻明確記載曇曜五窟是文成帝(440–465, 452–465 在位)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所造窟,五窟主尊皆為巨型雕像,是以佛像代替帝王,這些窟可以說就是帝王窟³,即帝王與佛一而二、二而一,但第7、8窟根本不是這種窟。在洞窟基本性質有別的狀況下,窟形、題材組合、造像服飾特徵等方面差別的意義還有多大?因此,第7、8窟與曇曜五窟的差異恰恰不能作為分期的主要依據。

在擯除表面差異後,可以發現第7、8窟造像與前賢所說雲岡二期⁴其他洞窟造像的差異也相當顯著。第7、8窟造像總體上矮胖、造型略笨拙、服飾西方特點強、衣紋高度凸起都構成與二期其他洞窟的不同,反而能在曇曜五窟中找到更多的相似點,特別是兩窟後室上層主尊晚期敷泥層掩蓋之下的衣紋為異常凸起的泥條,與作為曇曜五窟年代之首的第20窟造像衣紋如出一轍(圖2-1),也與中亞和犍陀羅地區造像幾無差別。曇曜五窟的主尊也並非都是這種衣紋,這與曇曜五窟主尊開雕的時間存在先後有關,這更說明這種凸起泥條式衣紋在雲岡存在的時間並不長,第7、8窟的始鑿時間當與第20窟相距不遠。曇曜五窟和第7、8窟之外的雲岡其他洞窟無一為這種衣紋。還有一些細節方面,如菩薩的仰月形飾寶冠、菩薩胸前的雙龍首項飾(圖2-2)、飛天呈菩薩狀而大裙裹腿、位於佛座兩側的回首雙獅、胡跪供養天的姿態等,都是第7、8窟與曇曜五窟聯繫的緊密程度大於與此後洞窟的標誌。

³ 雲岡曇曜五窟、第3窟、第5、6窟以及龍門賓陽三洞的佛像與皇帝可以直接比擬,因此本文將這些洞窟稱為“帝王窟”。雲岡第7、8窟等與上述洞窟規模懸殊,但仍非一般貴族官員所能開鑿,且這些洞窟在帝王窟附近,彼此關係密切,因此本文將這些洞窟稱為“皇家窟”。龍門盧舍那大佛由於與武則天有關,稱之為“帝王窟”可能更合適。

⁴ 本文所稱二期主要指宿白先生的分期,這一期被廣泛接受。



圖 2-1：雲岡第 20 窟主尊（採自《雲岡石窟全集》卷一七，第 2 頁）



圖 2-2：雲岡第 7 窟後室上層主尊（採自《雲岡石窟全集》卷五，第 27 頁）

其二，前賢從文獻角度對第7、8窟開鑿年代的推測不具備很強說服力。長廣先生將第7、8窟置於獻文帝時期已如宿白先生所言存在缺陷，但宿白先生的分析似乎仍有討論空間，下麵就不揣冒昧正面討論一下。

宿白先生根據《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常簡稱《金碑》）推測第7、8窟為遼代雲岡十寺中的護國寺⁵，這是有說服力的。宿白先生又說：“7、8窟雙窟，是第二期石窟中最早的一組，大約完成在孝文帝初期。據金皇統七年（1147）《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記載推測，這組雙窟是孝文帝所開，遼時即以此為主體興建了護國寺。⁶”重檢《金碑》，只有“今寺中遺刻所存者二：一載在護國，大而不全，無年月可考。”可知第7、8窟完成於孝文帝初年並無文獻記載的直接支持，而只是一種推測。按照這個推測，獻文帝在雲岡石窟歷史中被無形之中抹除了，這可能也是宿白先生不同意長廣意見的一個原因。

宿白先生還認為《金碑》中的“東壁有拓國王騎從”，是指雲岡第7、8窟東壁，這也很可能是合理的，但認為：“其實，此‘拓國王’系拓跋國王之略，連接引文上句（引者注：上句為“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知即指孝文帝而言。如果法軫《寺記》不誤，那麼探索護國雙窟的時代問題，就多了一條依據，而就第7、8雙窟造像的樣式言，置之於孝文帝初年，也是很合適的。”⁷宿白先生這個看法其實不一定合適，其將“拓國王”解釋為“拓跋國王”確有見地，但

⁵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發現的大同雲岡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59–60頁。

⁶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79頁。

⁷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00頁。

《寺記》所記難以肯定是題記本身，而且這個“拓國王”是否正確本就是個問題。此外，在雲岡石窟中未見有北魏皇帝領頭的供養人行列，何況第7、8窟並非大窟，出現皇帝為供養人的可能更微乎其微。至於第7、8窟的造像樣式，與曇曜五窟更相似，而不是後來的第9、10窟等，這在上文已有討論。

其三，第7、8窟可能是比曇曜五窟稍後但相應的雙窟。雙窟是雲岡石窟中的重要現象，宿白先生對此非常重視。但宿白先生特重孝文帝在雲岡營造史上的地位，不僅數次引用法軫《寺記》“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之語，還說：“如果第7、8雙窟興建於孝文帝初期的考慮不誤，那麼，除第一期開鑿的曇曜五窟和第三期開鑿的西部諸窟外，雲岡的主要窟龕幾乎都開鑿在孝文帝時期，它不僅包括第7、8，第9、10，第5、6這三組雙窟，而且包括第1、2雙窟，第11至13窟和雲岡最大的第3窟，還要包括自曇曜五窟迄遷洛前補刻在各窟內外的窟龕中的絕大部分。”⁸不僅第7、8窟，第3窟和第1、2窟本文也認為不太可能是孝文帝時期開鑿的，詳下。

按中國古代文獻特點，將法軫《寺記》所雲“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理解為修飾性質而非實際情況也屬正常。將四組雙窟的開鑿都認定屬於孝文帝時期就是一個值得注意和需要慎重的事情。十六國(304–439)晚期的張掖金塔寺東西窟已可算是雙窟，而不必等孝文帝馮太后(441–490)之出現始被發明。關於雲岡雙窟，以往都將之與孝文帝和馮太后相聯系，實際上馮太后與文成帝(440–465, 452–465在位)乃夫婦，為皇帝皇后開雙窟較之為祖孫開雙窟更合理，且與曇曜(活躍於五世紀70年代)的關係可能很大。

⁸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11–112頁。

以曇曜之智慧，既然能奏請為太祖以下五帝開大窟，那麼為當今皇帝皇后（即文成帝和皇后馮氏即後來的馮太后）開窟更是思慮易及且事半功倍之舉。也就是說，第7、8窟有可能是與曇曜五窟相應的雙窟，或可形象化稱之為“衛星窟”吧。如果將第7、8窟作為孝文帝時期最早開鑿的石窟，並且是雙窟，那麼何以是規模不大且為雙窟，倒是不太好理解的。

如果這個分析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這就為理解第9、10，第1、2窟，以及第11-13窟這些規模相近且較小的洞窟打開思路。這些窟規模都接近，也都有供養人⁹，都如衛星般如影隨形地出現在帝王窟附近，顯然不是帝王窟，但與帝王或皇家關係密切。第7、8窟是雲岡最早出現的雙窟，可能具有引領示範作用，此後的第9、10，第1、2，第5、6窟雖然大小有別，都不排除是對第7、8窟雙窟形式的模仿。

其四，為了更好地理解第三點，還有必要對第7、8窟與曇曜五窟不在同一個小山頭這一空間特點再作分析。第7、8窟選擇在現今這個位置是頗令人好奇的。在第7、8窟與曇曜五窟之間還頗有一段距離，其間並非沒有可以開鑿的崖面。從其他地區石窟的情況來看，第7、8窟有可能有意避開曇曜五窟而特地選擇開鑿在其東部的小山頭。

這裏可以引用龍門石窟來作說明。賓陽三洞系為北魏皇帝皇后所開，所在區域不見其他北魏洞窟，可見為一個特區¹⁰。還可以引證一下龍門石窟唐代的惠簡洞——公認的小廬舍那窟（圖3-1）。惠簡是大

⁹ 像有供養人的第7、8窟等一樣，第6窟在窟壁下部也有人物形象，但服飾與其他洞窟的供養人著鮮卑服不一樣，究竟是世俗供養人還是其他人物還不能確定。

¹⁰ 龍門皇甫公窟有小賓陽中洞之稱，彼此的相似性為學界公認。皇甫公窟窟主皇甫度（？-528）貴為北魏皇帝之舅，官為北魏太尉，有條件得到皇家石窟的樣本，但皇甫公窟與其他北魏洞窟的性質不同於賓陽三洞，它們不混處於同一區域是合理的。雲岡第7、8窟以及其他規模相近的雲岡雙窟的位置情況與皇甫公窟相似。



圖 3-1：龍門石窟惠簡洞主尊（採自《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二）圖版 88）



圖 3-2：龍門石窟大盧舍那像龕（採自《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二）圖版 115）

盧舍那像龕工程的第二主持人，或許實際主持人就是惠簡。排名第一的領導往往多是掛名，古往今來多是如此。惠簡洞完成於咸亨四年（673），早於大盧舍那像龕（圖 3-2）的完工年代上元二年（675）兩年。大盧舍那像龕是何等的神聖，盧舍那像甚至象徵了武則天，因此就可以稱之為帝王窟，但惠簡竟然“假公濟私”造了個小窟，而且還率先完工了。

准惠簡洞之例，我們是否可以考慮雲岡第 7、8 窟是“曇曜洞”，雲岡第 1、2 窟和第 9、10 窟等規模接近的雙窟是其他的高僧洞或王遇之類的大閻洞。總之，不論是像先賢那樣將第 7、8 窟作為第二期的開頭洞窟，還是如本文將第 7、8 窟納入曇曜五窟時期，雲岡的景觀在雲岡營造最早階段所發生的變化是一樣的。將第 7、8 窟納入最早階段，不僅為第 7、8 窟找到了歸宿，也可以為其他規模接近的雙窟找到歸宿，從而使雲岡石窟營造的整體性和階段性都更為明顯。

綜上所述，曇曜五窟和第 7、8 窟是雲岡營造史上最早出現的 7 個窟。第 7、8 窟在曇曜五窟開工不久也就開始開鑿了。以往將第 7、8 窟作為雲岡石窟營造下一階段的開端，主要是認為第 7、8 窟的特點與曇曜五窟差別很大，這個認識並非完美無瑕。第 7、8 窟很可能是曇曜及一批達官顯貴專門為文成帝和馮皇后（也可能是曇曜為自己）所開之窟，之所以選擇在曇曜五窟東部的另一個小山頭開鑿，是為了避開曇曜五窟所在的帝王窟這個神聖區域。第 7、8 窟與曇曜五窟所具有的相應關係，可能也存在於其他石窟之間。

二、雲岡二期其他洞窟的時空順序

第7、8窟之外，宿白先生認定的雲岡二期其他洞窟本文也都認可，但具體年代和序列則需討論，因為這同樣涉及到時空順序問題。

對於二期其他洞窟，宿白先生明確給出年代早晚順序者如下：9、10窟，1、2窟，5、6窟。宿白先生對第3窟、第11–13窟的某些特徵所具有的年代意義有所討論和比附，但沒有將此四窟明確置於上述六窟序列之中。宿白先生所持公允客觀態度，深值後輩學習。我們不僅需要像宿白先生一樣認識到現有資料沒有為第3窟、第11–13窟的年代提供充分證據，更需警視單線分期方法的局限性，也需要重新檢驗被賦予年代順序的9、10窟，1、2窟，5、6窟是否代表了洞窟開鑿的實際狀況，是否可能還有其他方案。

之所以如此考慮，一則雲岡石窟幾乎每一個洞窟都很有特點而不與他窟雷同。像通常的考古分期一樣，根據諸種特徵分析石窟的年代順序其實同樣需要大量的重複材料，但這個條件雲岡並不具備。宿白先生給出的9、10窟，1、2窟，5、6窟年代順序雖被普遍接受，但這幾個窟也沒有重複之例。這個序列也並不完全是對以上諸窟特徵的單純分析所得，而是借鑒了其他研究成果。這是理解前賢研究成果時不可不知之事，也是一個方法論合適與否的問題¹¹。

再者，按照宿白先生推定第9、10窟為鉗耳慶時在孝文帝初期的太和八年(484)至十三年(489)所開，第5、6窟在孝文帝定都平城的後期所開，其年代下限就當不晚於遷洛的494年。那麼9、10窟，1、2窟，5、6窟當是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開鑿而成。在這十年之間，大

¹¹ 這種方法論的潛在缺陷也不可忽視。

概除了褻衣博帶式的佛裝外，用以區別這些洞窟早晚的特徵恐怕未必都是新出現的特點，而可能只是選擇的不同而已¹²。鑒於以上兩點，對於第7、8之外的第二期洞窟的認識我們不妨轉換個角度，不一定非要單從時間軸的角度進行觀察。我們可以沿襲上文對第7、8窟的分析方式，從空間分佈狀況上對原第二期其他洞窟進行觀察分析。

1. 第3窟

就空間狀態而言，第3窟以其巨大的體量和未完工狀態最引人矚目。第3窟上部雙塔間“鑿一窟口南向的矩形窟室，室內主像為彌勒，壁面滿雕千佛，東西兩壁千佛中現釋迦坐龕像。¹³”宿白先生認為“此彌勒窟室，應是3窟的一部分，室內雕像的形制，約屬第二期的後半¹⁴。”宿白先生對彌勒窟室內雕像年代的判斷應該是可靠的，但這個彌勒窟室內雕像難以肯定是第3窟本來計畫的一部分，在很早開鑿的洞窟中雕出晚期形象在雲岡石窟中很常見，最典型者如第11窟中既有太和七年（483）題記又有第二期後半和第三期更流行的褻衣博帶裝七佛。也就是說，將第3窟上層中部彌勒窟室和兩端雙塔理解為原始工程的一部分，彌勒窟室內和雙塔上的造像系後來增刻，也不是全不合理。要之，從現存第3窟的跡象來看，只能推斷出第3窟的始鑿年代在第二期後半之前。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有

¹² 這就像現代某一地區的建築工程，在後代看來也是有年代序列的，但當時的每個時間點其實都有若干種可選方案。因此，由留存至今的遺存來推定年代順序很難反映當時縱橫交錯的實際情況。

¹³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13頁。

¹⁴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13頁。

一句話“又按《雲中圖》云：……獻文天安元年革興造石窟寺”，在金碑中此文隨後有一句“然未知有何所據”¹⁵。關於此點，宿白先生對《金碑》的校注也沒有提出新的材料或意見，僅云：“《雲中圖》一書不見著錄。……又《圖》云：‘獻文天安元年革興石窟寺，不知何據。’¹⁶”宿白先生最終沒有采信這句碑文。但獻文帝曾行幸武州山史有明載，《魏書》卷六〈顯祖紀〉：“（皇興元年秋八月）丁酉（皇興元年八月十八 = 西曆 467 年 10 月 2 日），行幸武州山石窟寺。”¹⁷《北史》卷二文同。由這些記載當然不能推導出獻文帝在雲岡造窟，但獻文帝與雲岡的關係卻不可完全漠視。

曇曜五窟是在文成帝即位後開始營造的，獻文帝即位後是否沿襲了文成帝的做法而另造石窟寺？第 3 窟體量超大，宿白先生支持其他學者推測此窟可能為曇曜雕鑿的大型禪窟的想法，依據是《續高僧傳》卷一《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傳》“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的記載¹⁸。這個推測不甚合理，第 3 窟非常之大，通常禪窟都很小；第 3 窟內保留有開山採石工程突然中止的現場，內部空間更不完整，這樣的場所不能說具備禪修的條件，也不具備作為大型佛寺的條件。頗有趣味的是，宿白先生對這個推測的支持中包含第 3 窟可能為曇曜所開的可能性，這說明宿白先生對第 3 窟的始開年代和特徵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意見。依本文來看，第 3 窟非與皇帝直接相關而不可，並可以理解為乘曇曜五窟甫開之勢而再進一步。

¹⁵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發現的大同雲岡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 53 頁。

¹⁶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發現的大同雲岡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收於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 59 頁。

¹⁷ 魏收(507-572)《魏書》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28 頁。

¹⁸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於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 83 頁。

第3窟另擇東部較大山頭為之，說明開大窟即為最初之規劃。第3窟主體尚未鑿出就廢止，似乎與獻文帝不數年而遜位並身死相關。要之，第3窟的規模和興廢當與北魏皇帝和北魏政治關係至密¹⁹。

2. 第1、2窟

在分析了第3窟後，與第3窟鄰近的第1、2窟自然就成為關注點。第1、2窟與第3窟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雕出雙塔。第1、2窟門外兩側各有一佛塔，第3窟上層東西兩端有兩個佛塔，這在雲岡石窟中是僅見的（圖4-1、圖4-2）。第1、2窟與第3窟的年代前後雖無從判斷，但彼此極可能存在關係，且第1、2窟體量小，又位於第3窟的東邊，這不能不讓人推測第1、2窟與第3窟的關係很可能類似於第7、8窟之於曇曜五窟，即第1、2窟是與第3窟相應的雙窟，也就是第3窟的衛星窟。獻文帝時期曇曜還維持著文成帝時期的地位，也許第3窟開鑿的實際主持人也是曇曜，同樣也是第1、2窟的牽頭人，所以能夠重複文成帝時的開窟模式。

第1、2窟也位於第5、6窟之東，是否可能為第5、6窟的衛星窟？第5、6窟為雙窟，公認當與孝文帝和馮太后有關。第5、6窟體量之大，雕造之精美生動，稱之為曇曜五窟式的帝王窟也不為過。准文成帝時期之例，在第5、6窟之東有相當距離的山頭雕造衛星窟，即今天稱之的第1、2窟，也不是沒有可能。不利於這個推測的是第1、

¹⁹ 宿白先生認為雲岡石窟與獻文帝基本無關，“因為根據文獻記載，獻文帝興建佛寺地點的選擇，似已轉到平城和北苑”（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10頁）。其實，宿白先生已經指出馮太后極度佞佛，獻文帝即位之時與孝文帝一樣，都是未成年人。馮太后長期實際主政，孝文帝時期雲岡石窟能不斷營建，獻文帝時期同樣可以。而且，造像、造窟與造寺一樣，常選擇在重大節日舉行是北魏時期常見現象，獻文帝即位後開鑿第3窟以示慶賀實屬正常。



圖 4-1: 雲岡石窟第 3 窟 (採自《雲岡石窟全集》卷一, 第 14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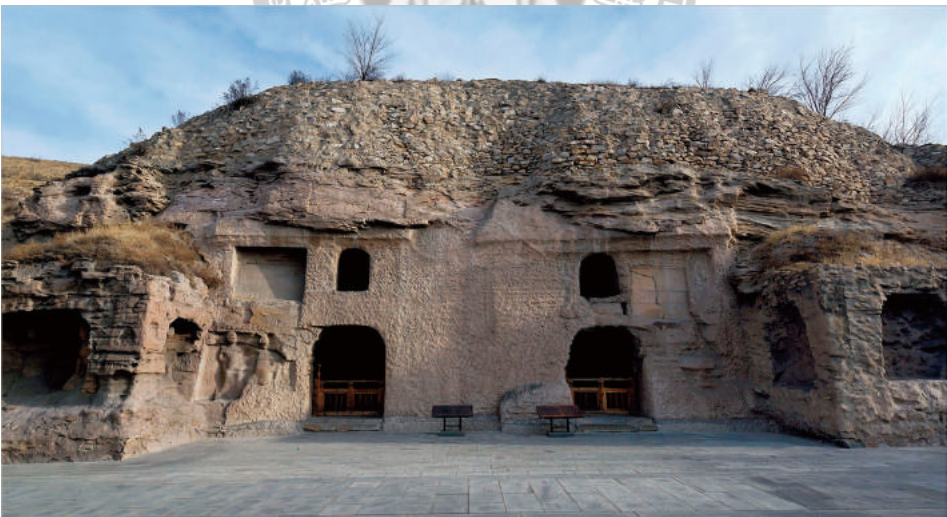


圖 4-2: 雲岡石窟第 1、2 窟 (採自《雲岡石窟全集》卷一, 第 3 頁)

2窟與第5、6窟之間已經存在第3窟這樣一個未完工的特大窟為間隔，因此，這個方案不如將第1、2窟作為第3窟的衛星窟。至於按照宿白先生的觀點，第1、2窟的年代要略早於第5、6窟，按照本文的觀點則不存在這個年代上的困難。

3. 第9、10窟

真正可能為第5、6窟衛星窟的是第9、10窟。宿白先生根據《金碑》和石窟面貌，將第9、10窟推定為孝文帝後期所開的崇教（即崇福）寺，這一考證的說服力很強。宿白先生又根據石窟特徵，將第9、10窟的年代置於第5、6窟之前，遂使第9、10窟與第5、6窟難以發生關係了。

上文已指出根據石窟特徵來擬定雲岡諸窟年代早晚的方法本身並不完善，這裏再舉龍門古陽洞為例。古陽洞中絕大多數龕像都雕造於孝文帝遷洛以後，但古陽洞很多龕像的服飾、建築特徵都接近曇曜五窟。如果不斤斤計較於可能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時間差，那麼第9、10窟與第5、6窟的相似性就很突出，彼此的工整、繁縟和精緻程度都十分相近。第9、10窟與第5、6窟的整體高度大概相差5米，以第9、10窟作為第5、6窟的衛星窟也未嘗不可。這個方案較之將第1、2窟視為第5、6窟的衛星窟可能要更合理，至於也間隔了第7、8窟，可能是此時在雲岡已經沒有多少崖面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4. 第11-13窟

第11-13窟的情況與其他洞窟似乎有所不同。宿白先生推測第11-13窟為組窟，認為第12窟是這三窟的中心窟。但第12窟體量小

於第 11 和第 13 窟，而且這三窟作為組窟的內涵宿白先生並沒有給予說明。至於第 11-13 窟崖面上留有的梁孔，不能表明此三窟北魏時期已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本文認為目前看來此三窟有一定聯繫，但作為組窟的依據不充分。

關於此三窟，最值得注意的是第 11 窟的太和七年(483)等題記、第 13 窟壁面下的供養人形象。夾於第 11 與第 13 窟之間的第 12 窟雖然沒有這類題記或形象，其營造年代也只能與二者大致前後，而且洞窟功德主的身份也大致相同。這是雲岡石窟中的重要現象，是民間資金更深入地介入雲岡石窟的標誌，當然這些民間力量絕不會真是普普通通的鮮卑平民。

這些供養人與第 7、8 窟和第 9、10 窟的可能相似，也可能都是實際參與出資的功德主，這再次說明了以第 7、8 窟為代表的較小的具有一定民間性的洞窟與帝王窟的區別。太和七年這個年頭也值得重視，從這方題記位於第 11 窟東壁中部來看，第 11 窟開始營造的年代要早於太和七年。按照宿白先生將第 9、10 窟推定為營造於太和八年至十三年(484-489)，則第 11 窟的開鑿年代要早於第 9、10 窟，從而連帶可能也早於第 5、6 窟。第 11 窟中還有太和十九年(495)造像龕，這不僅表明第 11 窟的營造活動至少持續了十餘年，也說明第 12、13 窟的開鑿時間可能也持續了很長時間。

如果上述推測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從第 7 到第 13 窟，雖然第 7、8 窟所在崖面與第 9-13 窟崖面之間略有分離，但實際上仍可算是連續分佈的七個窟，且規模和性質相近。這樣的分佈方式，大概也不能完全是無意為之，其中第 7、8 窟可能起到了不小的引領作用。看來，帝王窟(直接為皇帝、皇后或皇太后所造窟)要另覓山頭新建，衛星窟本來也要隔以山頭，但到第 9、10 窟時武州山已無合適地方，所以

夾處於已經存在的第 7、8 窟與第 11-13 窟之間，但第 9、10 窟的壁面仍然經過大規模的整修，遠非民間性甚強的第 11-13 窟可比。

對以上分析略作歸攏，獻文帝和孝文帝登基後可能都另開了大窟，這就是第 3 窟和第 5、6 窟，並且它們很可能也有自己的衛星窟，分別為第 1、2 窟和第 9、10 窟。大概從孝文帝即位不久，民間經濟力量就介入到雲岡石窟的營造活動中來，其表現是第 11-13 窟的建造，並形成規模和性質接近的第 7-13 窟連續性窟群。

三、結語

以往對雲岡石窟年代學研究所採取的方法中，樣式論和考古類型學是取得卓越成果的兩種方法。相比而言，考古類型學分析的專案更多，更注意前後事物之間聯繫，因此，考古類型學似較樣式論更為嚴密。但無論是樣式論還是考古類型學，以往研究所給出的分期結論都是單線式的，與雲岡石窟營造過程中的複雜狀況相比只是一種簡潔，甚至也可以說是簡單化的表達。在空間分佈狀況研究方面，樣式論和考古類型學更不易為力。

文獻記載一直為學者所倚重，對於認識雲岡石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無論如何解讀現存文獻資料，都無法坐實每一個洞窟的具體年代和窟主身份。方法論和文獻資料兩方面的局限性，決定了迄今學界對於雲岡石窟的年代和分期方案都是推測性認識。雲岡又是與皇家關係密切的特殊石窟群，基於歸納法的傳統考古類型學的有效性更打折扣。

本文著重指出了既往單線式、歸納式分期方法的缺陷，認為現有認識與雲岡營造的歷史實際相距甚遠。時間上新老交錯、空間上多

頭並進的演化狀態才更接近雲岡營造的歷史實際。因此，本文淡化了以往年代學研究所重視的石窟具體特徵，謹慎使用主要具有背景意義的文獻資料，加強了對每一窟初始營造狀況的分析，特別注重雲岡石窟營造在空間上的總體過程和分佈狀況，所得出的主要認識可作如下表述：

第一階段：曇曜五窟誕生，不久在其東部出現第 7、8 窟，相當於曇曜五窟的衛星窟；

第二階段：第 3 窟誕生，可能同時或隨後在其東部出現相當於衛星窟的第 1、2 窟；

第三階段：第 11–13 窟出現，三窟是否為組窟不明，但三窟與民間關係甚密，第 7–13 窟的連續分佈可能與這 7 個窟總體性質上的相近有關²⁰。

第四階段：第 5、6 窟誕生，第 9、10 窟作為第 5、6 窟的衛星窟而出現於第 7、8 窟之西（以第 1、2 窟為第 5、6 窟之衛星窟的可能性小）。

雲岡石窟的主體部分是曇曜五窟、第 3、第 5 和第 6 窟這樣的特大窟，它們是為帝王、皇后、皇太后所開的大窟，都可以稱之為帝王窟；次要部分是雲岡工程實際主持者及達官貴人出資為皇帝皇后（祖孫實為特例）祈福所開的衛星窟，如第 7、8 窟等；再次是祈福對象相同但出資人更多且更複雜的洞窟，即第 11–13 窟。

第 7、8 窟，第 1、2 窟，第 9、10 窟，所對應的主窟分別是曇曜五窟，第 3 窟與第 5、6 窟所對應的具體對象分別為文成帝和馮氏（即後來的馮太后）夫婦、獻文帝夫婦（不能確定其時獻文帝是否已婚

²⁰ 第 4 窟可能也出現於這個階段，性質與第 7–13 窟也相近。

配，或獻文帝與馮太后)、孝文帝與馮太后²¹。帝王窟和為帝王、皇后(或皇太后)所開的大窟與衛星窟之間有意製造出一定的空間間隔，以保證前者的神聖性。皇位的轉換和雲岡崖面的有限，造成了雲岡營造的交錯複雜局面。留存至今、看似一體的雲岡石窟實際上不僅是宗教與政治，也是皇權與高僧、顯貴各自表達存在感的場域。以上便是本文的基本認識。

最後，必須再次聲明的是，本文的認識也只是一種推論而已。



²¹ 不是孝文帝而是馮太后，才與平城時代雲岡營造的主要過程密切相關，宿白先生對此有明示（前揭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12頁）。但宿白先生在具體到雲岡二期洞窟時，並沒有將這個想法充分貫徹，而是對孝文帝的作用予以高度評估。獻文帝像孝文帝一樣，都是幼年即位，實際操控北魏政權的是馮氏。既然孝文帝時期雲岡營造能大肆開展，沒有理由不認為獻文帝時期存在同樣情況，按照這個推想，就不必將第7、8窟，第3窟，第1、2窟都推壓到孝文帝時期。按照宿白先生的意見，第9、10窟的營造主持者為鉗耳慶時，則第5、6窟的營造主持者也當為鉗耳慶時。第5、6窟現在一般都接受是為孝文帝和馮太后所造的雙窟。按照本文推測，第3窟鑿造於獻文帝即位後不久，但是為獻文帝和其母馮氏所造，還是為文成帝和皇后馮氏所造，並不能肯定。